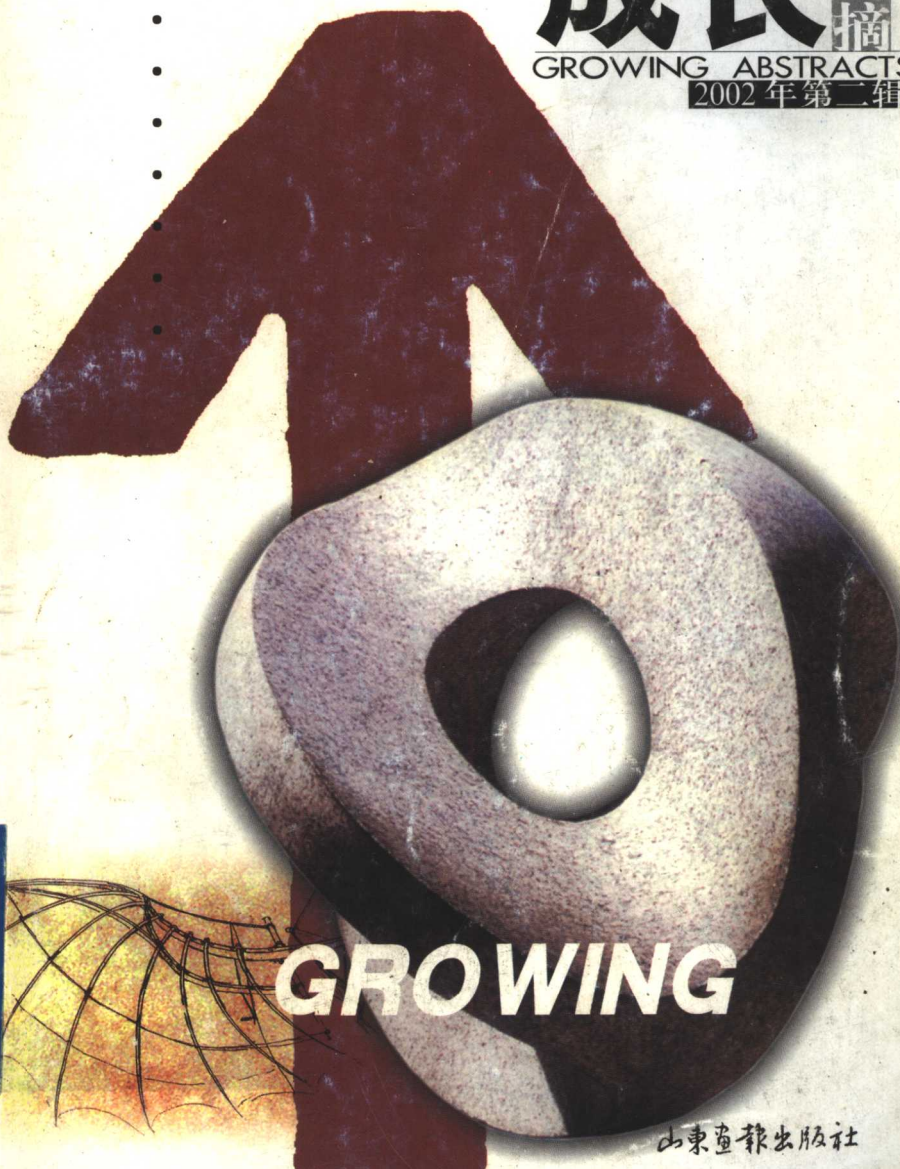


成长 文摘

GROWING ABSTRACTS

2002 年第二辑



GROWING

山東畫報出版社



盲女 [英国] 约翰·埃·密莱

李元 解说

明朗的画面，强烈的对比和伤感的情调充满了画面。两个农村姑娘坐在田野路边，小女孩为盲女描述那如画的自然美景，大地、鸟儿和远处的彩虹，盲女却一无所知，陪伴她的只是那只破旧的手风琴。



少年时代 [英国] 密拉斯

李元 解说

少年时代的两个孩子在海边听渔夫给他们讲述那些惊险的故事，听得是那么专注入神，渔夫的姿态是那么生动，虽然是背影，但不难想像出他的面部表情。蓝色的大海把人们的意境伸向远方。

中漂浮的云彩一样孤独地坐在太空之中。他不睡，因为不知睡为何物。他不饿，因为不知饿为何感。于是他就这样不吃不睡地过了很长时间，直到一个思想在他脑海中浮现。他自言自语地说：“我要创造出一件东西来。”

——吉尔伯特群岛 迈亚纳岛关于创世的神话

一段出奇的宁静，一段无法量测的时间长河，从我们顶上流过。游戏已被我们遗忘，乔治和我都不再是找路回家的鸽子，我们的家不单是在遥远的彼方，而且是属于古老的过去，再也回不去。我们成了自由的灵魂，在宇宙间四海为家，不拘何处……我们把老家留在地球上，往昔使人们彼此分隔的语言障碍，都完全抛开了。

——F.J. 戴森 摘引儿子乔治远足探险时写的长诗

在风筝落入树林前
当这条线还没有变得无用把它握在你的两手中，
小家伙们，去感受那
任性飘动，感受那种根深蒂固，那长尾巴拖着的
悲伤。
你们天生能够胜任。
站到这儿来在我面前
抓住其中的紧张。

——西默斯 希尼

者
手
抄



主编 朱正琳
本辑特约撰稿人 徐友渔 周国平 杨建邺
郑也夫 张冠生 王天兵
吴国盛 黄集伟
责任编辑 汪稼明 美术编辑 李海峰
特约插图 黎青
编辑出版 山东教育出版社

目录

二〇〇二年第二辑 总第七辑
《成长》编辑部 E-mail: growing@163.com

世界篇

- 4/ 方法谈 笛卡尔
10/ 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 约翰·密尔
18/ 环保美术欣赏 李元
21/ 虫洞和时间旅行 霍金
31/ 宇称守恒的崩溃 M·加德勒
45/ 差序格局 费孝通
52/ 经济学、责任和法律 斯蒂格利茨
54/ 关于电视 皮埃尔·布尔迪厄
64/ 走向世界二百年 丁林
附：还有什么是可以希望的呢？ 波恩
82/ “信息”的历史 西奥多·罗斯扎克
98/ 无夏季节 菲利普·塞福 / 南希·塞福
101/ 瑞士的湖上住宅

人生篇

- 104/ 科学之路 卢里亚
114/ 寻求秩序——钱德拉塞卡对黑洞、蓝天和科学创造力的思考 John Tierney
124/ 翻阅自我——阅读的秘密 斯文·伯克茨

在毁灭的大地上，最后一个艺术家所写的书，即使他极其天才地把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和谐地联系在一起，也只不过是一堆废纸和垃圾，因为写书的目的是对空幻的呼唤，而是在另一个人心灵中引起共鸣，是表达思想，传递感情。

——尤·邦达列夫

- | | |
|---|---------------------------------------|
| 133/ 人类的婴儿是胚胎 | 斯蒂芬·杰·古尔德 |
| 140/ 他的成长和艺术界无关
附：《弗朗克·奥尔巴赫》简介 | 罗伯特·休斯
王天兵 |
| 145/ 《音乐之声》以后的故事 | 维 一 |
| 151/ 《贝多芬传》摘抄（五则）
贝多芬的启示
和人生重新缔了约
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
他的一生宛如一天雷雨的日子
贝多芬遗嘱 | 傅 雷
罗曼·罗兰
罗曼·罗兰
罗曼·罗兰
贝多芬 |
| 网上实录 | |
| 165/ 知识分子的跑步文本 | 黄集伟 辑录 |
| 167/ 一位父亲向孩子们解说奥斯威辛时遇到的困难 | 君特·格拉斯 |
| 私人笔记：历史边角 | |
| 171/ 爱因斯坦与以色列总统的职位 | |
| 173/ 战争并不意味着回到野蛮主义 | |
| 私人笔记：热词汇 | |
| 174/ 城市蒸发 | |
| 174/ 出网入世 | |
| 175/ 编者手记 | 朱正琳 |

方法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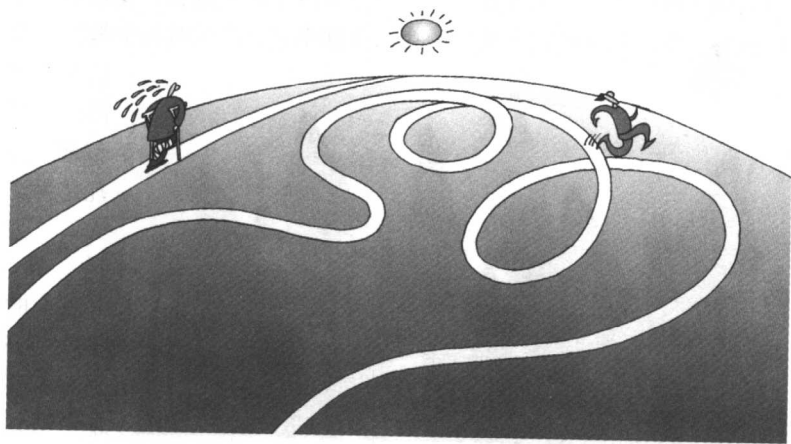
笛卡尔

良知是世界上分配得最均匀的东西，因为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在这一方面有非常充分的秉赋，即便是那些在别的一切方面都极难满足的人，也不大会对自己这一方面的秉赋不满足，更作额外的要求。在这一点上，大概并不是人人都弄错了；这一点倒可以证明，那种正确地做判断和辨别真假的能力，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称之为良知或理性的那种东西，是人人天然地均等的；因此，我们的意见之所以不同，并不是由于一些人所具有的理性比另一些人更多，而只是由于我们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运用我们的思想，以及考察的不是同样的东西。因为单有良好的心智是不够的，主要在于正确地应用它。那些最伟大的心灵既可以做出最伟大的德行，也同样可以做出最重大的罪恶；那些只是极慢地前进的人，如果总是遵循着正确的道路，可以比那些奔跑着然而离开正确道路的人走在前面很多。

至于我，我从来没有自负自己的心智有丝毫比一般人的心智更加完善的地方，甚至于我还常常希望自己具有同某些别的人一样敏捷的思想，或者一样清楚明晰的想像力，或者一样广阔或一样生动的记忆力。除了这些性质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性质可以用来使心智完善；因为说到理性或者良知，既然它是惟一使我们成为人并且使我

们与禽兽有区别的东西，所以我很愿意认为它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是完整的，并且愿意在这一方面遵从哲学家们的共同意见，他们说：同一个种类的各个个体，只是在所具有的偶性方面可以有多一些或少一些的差别，它们所具有的形式或本性则并无多少区别。

不过我可以毫不踌躇地说，我觉得我有很大的幸运，从青年时代以来，就发现了某些途径，引导我做了一些思考，获得一些公理，我从这些思考和公理形成了一种方法，凭借这种方法，我觉得自己有了依靠，可以逐步增进我的知识，并且一点一点把它提高到我的平庸的才智和短促的生命所能容许达到的最高点。因为我已经从这种方法得到了这样一些收获，所以虽然我对自己所作的判断总是努力倾向于不相信的方面而不倾向于自负的方面，虽然我用哲学家的眼光去看一切人的各种活动和事业时觉得几乎没有一样不是空虚无用的，然而我对于自己认为在追求真理方面所作出的进展，不禁感到一种极度的满意，以致对将来抱着这样大的希望：如果在纯粹是人的人们的职业中间，有一种职业着着实是良好而且重要的，我敢相信就是我所选择的那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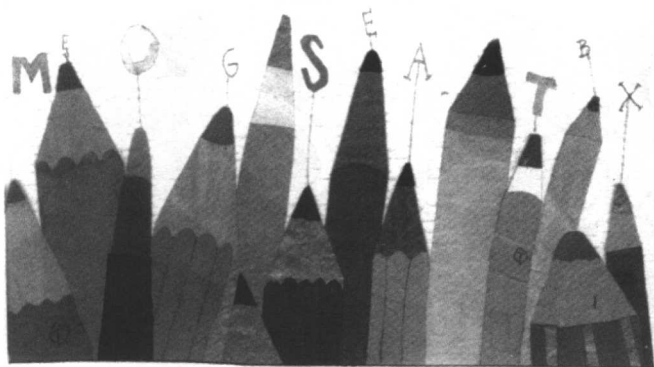


然而可能是我弄错了，也许我拿来当作黄金和钻石的，只不过是有一点黄铜和玻璃。我知道，我们在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上，是多么容易弄错，我也知道，我们的朋友们的判断，在使我们高兴的时候，是多么值得我们怀疑。可是我很愿意在这篇谈话中说出，我所遵循的是些什么途径，并且把我的生活历历如绘地描述出来，使每一个人都能加以评判，以便从大家的声音中听取对我的意见；这可以说是在我惯常采用的方法以外所增加的一种教育自己的新方法。

因此，我的计划并不是在这里讲授一种人人必须遵循着来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的方法，而只是说出我曾经用什么方式努力运用过我的理性……

我自幼就受到典籍的教育，因为我听信了人们的话，认为靠读书就可以对一切有益于人生的东西得到一种明白而且可靠的知识，所以我怀着一种极大的欲望去学习典籍。可是当我全部修毕这些课业，照例被认为成了学者的时候，我的意见就立刻完全改变了。因为我发现自己为这样多的怀疑和错误所困扰，因而觉得我的努力求学并没有得到别的好处，只不过是愈来愈发觉自己的无知。然而我进的是欧洲最有名的一所学校，如果世界上任何地方有博学之士的话，我想那里就应该有。我在那里把别人所学的功课全部学过，甚至对先生教给我们

的那些学问还感到不满足，凡是讨论人们认为最奇异、最稀有的学问的书籍，只要能够落到



我的手里，我都把它读了。此外我也知道别人对我所作的评判，虽然我的同学中间已经有几位被选定候补我们的老师们的职位，我却并没有见到过任何人认为我不如他们。最后，我觉得我们的世纪在人才方面和过去任何一个世纪是同样地兴盛，同样地丰富；这就使我可以有自由凭自己的看法去评判所有的别人，并认为世界上并没有一种学说是像从前人们使我希望的那样。

诚然我们不见有人仅仅为了以另一种方式重建城中房屋，使街道更加美丽，竟把全城的房屋通通拆光；但是常常见到有许多人为了重建自己的房屋而把它拆掉，甚至有时房屋有自行倒塌的危险或者屋基不很巩固，人们不得已也只有加以拆除：准照这个例子，我深信个人要想靠从根本上改变一切、靠把国家推翻重建的办法来改造一个国家，确实是不可能的；同样地，要想改造各门学问的整体或学校里讲授各门学问的成规，也确实办不到，但是，说到我心里直到现在所信服的那些意见，我却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只有把它们一下通通清除出去，以便空出地位，然后或者安放上另外一些更好的意见，或者当我把原来的意见放在理性的尺度上校正之后，再把它放回去。我深信用这种方法来指导我的生活，所得的成就将会大大超过只是在旧的基础上进行建筑，以及只是依据我青年时代没有考察是否真实便加以相信的那些原则……

既然法律条文过多常常会使犯罪的人有所推托，因而一个国家如果法令很少而得到严格遵守，就可以治理得很好，所以我相信，不要那些数目很多的构成逻辑的规则，单有以下四条，只要我立下坚定持久的决心，决不要在任何时刻不去遵守它们，那就已经足够了。

第一条是：决不把任何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其为真的东西当作真的加以接受，也就是说，小心避免仓促的判断和偏见，只把那些十分清楚明白地呈现在我的心智之前，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放进我的判断之中。



第二条是：把我所考察的每一个难题，都尽可能地分成细小的部分，直到可以而且适于加以圆满解决的程度为止。

第三条是：按照次序引导我的思想，以便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到对复杂的对象的认识，即便是那些彼此之间并没有自然的先后次序的对象，我也给它们设定一个次序。

最后一条是：把一切情形尽量完全地列举出来，尽量普遍地加以审视，使我确信毫无遗漏。

.....

我并没有因此就放开胆量，一开始就把所遇到的一切科学的难题都拿来考察，因为这样做本身就违背了这种方法所规定的程序，但是我注意到，一切科学的原则都应当是从哲学里面取得的，而在哲学里我还找不出任何原理是确定的，所以我想，我应当首先努力建立哲学中的原则。我又想，这件工作既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而在这件工作中又最怕仓促的判断和偏见，所以我要想在这件事情上得到成就，只有等到比当时的二十三岁更加成熟的年龄，只有在事前用许多时间来给自己在这一方面做准备，一方面把以往我所接受的一切坏的意见都从我的心里拔除干净，一方面积累若干经验，作为我以后进行推论的材料，同时经常练习应用我所规划的那种方法，以便使自己这一方面的能力逐渐巩固起来。

最后，既然在动手重建住所之前，仅仅把旧房屋拆倒，预备好材料，请好建筑师，或者亲自来从事建筑设计，再仔细画好新房屋的图样，仍然是不够的，还必须准备下另外一所房屋，可以在施工期间舒舒服服地住在里面，因此，为了使我在受理性的驱使对我的那些意见保持怀疑态度的时候，不要在行动方面犹疑不决，为了使此后仍然能够尽可能地过最幸福的生活，我曾经给自己订立了一个暂行的行为守则，这个守则只包括三四项规条，我很愿意把它们报告给各位。

第一项是：服从我国的法律和习惯，笃守上帝恩赐我从小就领受到的宗教信仰，并且在其他一切事情上，遵照那些最合乎中道、离开极端最远、为一般最明哲的、我应当在一起相处的人在实践上共同接受的意见，来规范自己……

我的第二项规条是：在行动上要尽可能做到最坚决、最果断，当我一旦决定采取某些意见之后，即便这些意见极为可疑，我也始终加以遵守，就像它们是非常可靠的意见一样……

我的第三项规条是：始终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运，只求改变自己的欲望，不求改变世界的秩序，一般地说，就是养成一种习惯，相信除了我们的思想之外，没有一件东西完全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这样，我对在我们以外的事物尽力而为之，凡是我们不能做到的事，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了。

我早就指出过，在行为方面，有时候需要遵从一些明知不可靠的意见，把它们当作无可怀疑的意见看待，就像上面所说的那样。但是由于我现在只要求专门研究真理，我想我的作法应当完全相反，我应当把凡是我能想出其中稍有疑窦的意见都一律加以排斥，认为绝对虚假，以便看一看这样以后在我心里是不是还剩下一点东西完全无可怀疑。

■ 摘自《16—18世纪西欧各国哲学》 商务印书馆 1975

■ 荐稿人：徐友渔

荐稿人附言：

法国伟大的哲人笛卡尔向我们坦露了他在青年时代人生思索紧要关头的思想方法和处世原则：思想上无限大胆，彻底怀疑，实际行动却谨小慎微，决不逾越法律和狭谷。这是一种好方法。生命只有一次，生活往往是覆水难收，一失足成千古恨，但世俗的考虑又不能成为我们体悟人生真谛的羁绊。

——徐友渔

论思想自由

约翰·密尔

对于人类的良好辨识可称不幸的是，在他们实践的判断中，他们的可能错误性这一事实远没有带着它在理论中倒常得到承认的那样分量；即每人都深知自己是可能错误的，可是很少有人想着有必要对自己的可能错误性采取什么预防办法，也很少有人容有这样一个假定，说他们所感觉十分确定的任何意见可能正是他们所承认自己易犯的错误之一例。一些专制的君主，或者其他习惯于受到无限度服从的人们，几乎在一切题目上对于自己的意见都感有这样十足的信心。有些处境较幸的人，有时能听到自己的意见遭受批驳，是错了时也并不完全不习惯于受人纠正——这种人则是仅对自己和其周围的或素所顺服的人们所共有的一些意见才予以同样的无限信赖；因为，相应于一个人对自己的孤独判断之缺乏信心，他就常不免带着毫不置疑的信托投靠在一概“世界”的不可能错误性。而所谓世界，就每个个人说来，是指世界中他所接触到的一部分，如他的党、他的派、他的教会、他的社会阶级；至于若有一人以为所谓世界是广泛到指着他自己的国度或者他自己的时代，那么，比较起来，他就可称为几近自由主义的和心胸广大的了。这个人对于这种集体权威的信仰，也绝不因其明知其他时

代、其他国度、其他党、其他派、其他教会和其他阶级过去曾经和甚至现在仍然抱有正相反的思想这一事实而有所动摇。他是把有权利反对他人的异己世界的责任转交给他自己的世界了；殊不知决定他在这无数世界之中要选取哪个作为信赖对象者乃仅仅是偶然的机遇，殊不知现在使他在伦敦成为一个牧师的一些原因同样也会早使他在北京成为一个佛教徒或孔教徒——而这些他就不操心过问了。可是，这一点是自明的，也像不拘多少论据能够表明的那样，时代并不比个人较为不可能错误一些；试看，每个时代都曾抱有许多随后的时代视为不仅讹误并且荒谬的意见；这就可知，现在流行着的许多意见必将为未来时代所排斥，其确定性正像一度流行过的许多意见已经为现代所排斥一样。

对于上述论据看来要提出的反驳，大概会采取如下的形式。这就是要说，在禁止宣传错误这件事情中比在公共权威本着自己的判断和责任所做的其他事情中，并不见更多地冒认了不可能错误性。判断传给人们，正是为了他们可以使用它。难道可以因为判断会被使用错误，就告诉人们完全不应使用它吗？要禁止在他们想来是有害的事，并不等于要求全无错误，而正是尽其分所固有的义务要本其良心上的信念而行动，纵使可能错误。假如我们因为我们的意见可能会错就永不本着自己的意见去行动，那么我们势必置自己的一切利害于不顾，也弃自己的一切义务而不尽。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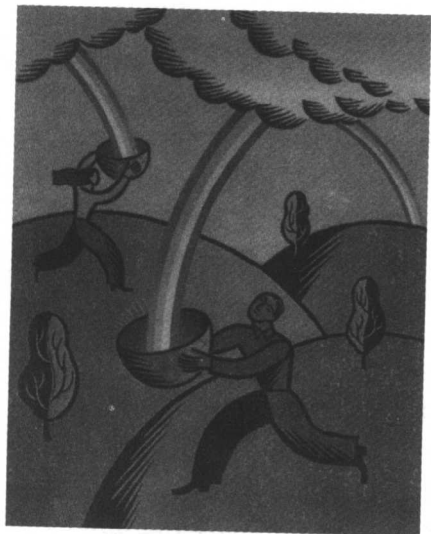


个适用于一切行为的反驳，对于任何特定的行为就不能成为圆满无缺的反驳。这是政府的也是个人的义务，要形成他们所能形成的最正确的意见，要仔细小心地形成那些意见，并且永远不要把它们强加于他人，除非自己十分确信它们是对的。但是一到他们确信了的时候(这样的推理者可以说)，若还畏怯退缩而不本着自己的意见去行动，并且听任一些自己真诚认为对于人类此种生活或他种生活的福利确有危险的教义毫无约束地向外散布，那就不是忠于良心而是怯懦了。因为在过去较欠开明的年月里其他人们曾经迫害过现在相信为正确的意见，人们就会说，让我们小心点，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吧；但是政府和国族也在其他事情上犯过错误，而那些事情却并未被否认认为适于运用权威的题目。它们曾征收苛税，曾进行不正当的战争；我们难道应该因此就不收税，就在任何挑衅之下也不进行战争么？人、政府，都必须尽其能力所及来行动。世界上没有所谓绝对确定性这种东西，但是尽有对于人类生活中各种目的的充足保证。我们可以也必须假设自己的意见为正确以便指导我们自己的行为；而当我们去禁止坏人借宣传我们所认为谬误和有害的意见把社会引入邪途的时候，那就不算是假设了。

对于这个反驳，我答复道：这是假定得太多了。对于一个意见，因其在各种机会的竞斗中未被驳倒故假定其为正确，这是一回事；为了不许对它驳辩而假定其正确性，这是另一回事：二者之间是有绝大区别的。我们之所以可以为着行动之故而假定一个意见的正确性，正是以有反对它和批驳它的完全自由为条件；而且也别无其他条件能使一个像具有人类精神能力的东西享有令他成为正确的理性保证。

我们且就意见史或人类生活中的普通行为想一下，试问，这个人或那个人之所以不比他们现在那样坏一些，这应归因于什么呢？当然不应归之于人类理解中固有的力量，因为，对于一桩不是自明的事情，往往会有九十九个人完全无能力而只有一个人有能力对它做出判断，而那第一百位的能力也只是比较的；因为，在过去的每一代中，都有多数杰出的人主张过不少现在已知是错误的意见，也曾做过或赞成过许

多现在没有人会认为正当的事情。可是在人类当中整个说来究竟是理性的意见和理性的行为占优势，那么这又是什么原故呢？假如果真有这种优势的话——这必定是有的，否则人类事务就会是并且曾经一直是处于几近绝望的状态——其原故就在于人类心灵具有一种品质，即作为有智慧的或有道德的存在的人类中一切可贵事物的根源，那就是，人的错误是能够改正的。借着讨论和经验人能够纠正他的错误。不是单靠经验，还必须有讨论，以指明怎样解释经验。错的意见和行事会逐渐降服于事实和论证，但要使事实和论证能对人心产生任何影响，必须把它们提到面前来。而事实这东西，若无诠释以指陈其意义，是很少能够讲出自己的道理的。这样说来，可见人类判断的全部力量和价值就靠着一个性质，即当它错了时能够被纠正过来；而它之可得信赖，也只在纠正手段经常被掌握在手中的时候。如果有一人，其判断是真正值得信任，试问它是怎样成为这样的呢？这是因为他真诚对待对他的意见和行为的批评。这是因为，他素习于倾听一切能够说出来反



对他的言语，从其中一切正当的东西吸取教益，同时对自己，间或也对他人，解释虚妄的东西的虚妄性。这是因为，他深感到一个人之能够多少行近于知道一个题目的全面，其惟一途径只是聆听各种不同意见的人们关于它的说法，并研究各种不同心性对于它的观察方式。一个聪明人之获得聪明，除此之外绝无其他方式；就人类智慧的性质说，要变成聪明，除此之外也别无他样。保有一种稳定的习惯要借着与他人的意见



相校证来使自己的意见得以改正和完备，只要不致在付诸实行中造成迟疑和犹豫，这是可以对那意见寄以正当信赖的惟一的稳固基础。总之，一个人既经知道了一切能够(至少是明显地)说出来的反对他的言语，而又采取了反对一切反驳者的地位——深知自己是寻求反驳和质难而不是躲避它们，深知自己没有挡蔽能够 from 任何方面投到这题目上来的任何光亮——这时他就有权利认为自己的判断是比那没有经过类似过程的任何人或任何群的判断较好一些。

向人类提醒这样一件事总难嫌其太频吧，从前有过一个名叫苏格拉底(Socrates)的人，在他和他那时候的法律权威以及公众意见之间曾发生了令人难忘的冲突。这个人生在一个富有个人伟大性的时代和国度里，凡最知道他和那个时代的人都把他当作那个时代中最有道德的人传留给我们；而我们又知道他是以后所有道德教师的领袖和原型，柏拉图(Plato)的崇高的灵示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明敏的功利主义——“配成健全色调的两位宗匠”，这是道德哲学和一切其他哲学的两个泉眼——同样都以他为总源。这位众所公认的有史以来一切杰出思想家的宗师——他的声誉到两千多年后还在继长增高，直压倒全部其余为其祖国增光生辉的名字——经过一个法庭的裁判，竟以不敬神和不道德之罪被国人处死。所谓不敬神，是说他否认国家所信奉的神祇，真的，控诉他的人就直斥他根本不信仰任何神祇(参阅“谢罪”篇)。所谓不道德，是就他的教义和教导来看，说他是一个“败坏青年的人”。在这些诉状面前，有一切根据可以相信，法官确是真诚地认为他有罪，于是就把这样一个在人类中或许值得称为空前最好的人当作罪犯来处死了。

再举另一个司法罪恶的事例，这件事即使继苏格拉底处死事件之后来提，都不显得是高峰转低，这就是一千八百多年以前发生在加尔瓦雷(Calvary)身上的事件。这个人，凡曾看到他的生活和听到谈话的人都在记忆上对于他的道德之崇高伟大留有这等印象，以致此后十八个世纪以来人们都敬奉为万能上帝的化身。他竟被卑劣地处死了。当